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

主编

任天石

二十世纪 中国社会思潮史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史论

主 编 任天石
副主编 严 强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南京

(苏)新登字第 011 号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史论

任天石 等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08)

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180 千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305—02039—7/C·59

定价:4.8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参加本书编写人员：

一 平 王 建 王庆福

任天石 宋吉述 张路华

振 亚 梁 勇

目 录

第一章	传统的绝唱.....	1
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心理.....	2
二	来自传统内部的变革呼声	10
第二章	迷途的羔羊	33
一	五四时期西方思潮的涌入	34
二	胡适的实用主义同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	45
三	“东方文化派”对西学的拒斥和主张振兴东方文化	56
四	五四前后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63
五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泛滥	70
第三章	星星井冈火	79
一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80
二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运动	92
三	国共合作与新三民主义	97
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2
第四章	燎原延安势.....	113
一	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因、内容与作用	114
二	延安精神的内涵.....	123
三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138
第五章	硝烟下的灵魂.....	141

一	无奈的反抗·····	142
二	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145
三	肮脏灵魂的叫卖·····	158
四	灵魂的抉择与皈依·····	162
第六章	危楼上的表演·····	169
一	筑起危楼与扯发自救·····	169
二	衰败的党风·····	178
三	追逐着时代灵魂的艺术精灵·····	188
第七章	火红的年代·····	197
一	建国初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化与思想建设的 顺利开展·····	198
二	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	213
第八章	疯狂的代价·····	231
一	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运动·····	232
二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	236
三	从迷惘到觉醒的心态轨迹·····	239
四	畸变的思想文化观念·····	241
五	凋蔽的文艺园地·····	245
六	文革时期的教育和科技·····	250
七	文革时期精神生活的特点·····	254
第九章	复苏与起飞·····	260
一	政治思想领域走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261
二	经济变革与观念变化·····	268
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重要性·····	276

第一章 传统的绝唱

传统,作为民族的深层文化积淀,深植于民族的历史土壤中,有着特定的文化构成。在传统那里,积极和消极、进步和落后、开放和封闭是杂揉在一起的。当传统受到外界压力时,自身也在变化,传统的变化作为一个时代精神文明的标志,支配着这一时代人的社会生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就是处在一个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撞击的时代,这是一个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尚未来临的时刻,社会的诸种现象都呈现出交替期的特征:一方面是外来西方文明对中国固有传统文明的冲击,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抵触,这是一个传统在外力撞击下蜕变和新生的过程,在这里,对传统的怀疑与对传统的价值发现同步进行,并产生剧烈的矛盾对抗,由此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动人的传统的绝唱。

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心理

(一)、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文化的走向

社会心理是文化的最深层结构,从根本上说,它制约着一个民族的生存选择,决定着这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鸦片战争是中西文化撞击的开始,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前,民族心理就早已存在了。因而,考察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心理,有必要对鸦片战争前中西文化的走向做一简略的回顾。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国东临太平洋,北部为西伯利亚平原,西部和南部均为高山。在一个较为安定的地理环境内,中国人长期从事着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培养了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态。在坚信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下,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把自己封为“真龙天子”,由此规定了上行下效的一系列生存原则,“皇天在上”与“重义轻利”的伦理思想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做为民族的凝聚力而存在着。中国也曾有过思想开放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到了汉代,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就变成儒家的一元结构。汉以后,历代统治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为儒家经典注疏,更突出了传统文化的人伦教化作用,用“君臣父子、修齐治平”八个字便可概括全部底蕴。这是一种以“仁、义、礼、智、信”为准则的教化观,它以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改革为

特征，即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定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在中国文化中，既有深植于民族精神土壤内的积极进取精神、又有着以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可是，到了清代，当这种传统与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变成“求全自保”、以“天朝大国”自居的灵魂麻醉剂，进步与保守、优良与粗劣、爱国与卖国杂揉在一起，以致掩盖了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

西方文化是源于古希腊地中海流域的一种文化，开放的地理环境与海洋性气候形成了这一民族的积极进取心理。它以重实用、重理性的科学精神表现出自身的优势，在近代，它与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结合在一起，就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力。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文明各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在先秦，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秦汉以至唐宋，中国文明达到顶峰，出现了辉煌的汉唐风度，而西方文明则是天主教统治着欧洲。这一时期四大发明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是中国人对人类文化贡献出的优秀成果。中国也曾有过不太保守的时代，如汉唐就是与东亚、中亚、欧洲发生交往的，四大发明也由此相继传到欧洲，但由于中国人重人伦轻科学的文化心理使四大发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中国火药被制成烟花、爆竹，造纸、印刷术专用来印经卷，指南针成为风水先生的工具，而西方人则推陈出新，把火药制成炸药，把造纸、印刷术用于流通，把指南针变成航海的工具。中国因自己的国势落后而日益保守。这样，在鸦片战争前中西方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在西方，英国于1640年完

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其后又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大机器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法国于1794年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来者居上,很快赶上英国;美国1775年—1783年独立战争后,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生产力发展相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经济内部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增长起来:首先是从地中海北岸的城市市民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经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新的活动场所。”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而在中国,清政府分别于1645年、1646年剿灭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队伍、接着是大兴文字狱、八股取士,使士林文人沉没于故纸堆中,不问时事。在这一时期,如果打破历史的空间就可以看到,在亚欧大陆的两边“一边是黄河岸边柳荫下烘炉风箱与手摇纺车的缓慢节奏,一边是约克郡瓦特发明蒸汽机的隆隆巨响;一边是潇洒的满清帝王爷的文治武功,一边是查理一世、路易十六的人头落地;一边是两鬓斑白的范进型仕子们为寻求士途门路出入考场,并因自己的中举发生神经错乱,……一边是英姿勃发的牛顿通过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宇宙天体,伽利略通过重锤落地研究自由落体运动”(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这里,西方的“飞跃”与中国的“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鸦片战争后的文化态势

• 与西方经济发展相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必然发动侵略战争,以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样,到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西文化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中西文化直接接触早在鸦片战争前两百年就已发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先后把资本主

义早期的物质精神文化如钟表、玻璃器皿、太阳历、地球图、铸炮术等带到中国。当时中国是强大的，中国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无不表现为大国的情怀：或任用他们为官，或把他们驱逐回国，只是一纸诏令的事；天朝大国的心态也形成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据利玛窦说，在当时中国人的地图上，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四周分布着一些小岛，上面写着中国人所知道的一些国家的名字，而这些国家的面积加起来总和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大。中国人的这种盲目自大心理阻止了他们对世界的科学认识，以致鸦片战争中国英国交战两年后，清朝皇帝还不知英国的地理位置。面对西方文化的撞击，清政府对西方先进的文化成果根本不感兴趣，一律斥之为“奇技淫巧”，象说“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需借西洋钟表以定时序”，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需借外国以通有无”，说“宁可使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其顽固僵化之态可见。说“西学源于中学、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如“西方数学源于《易》、机器学源于班、墨化源于炼丹术、五洲学源于邹衍”等，“中国之大何患无才何必夷，何必师夷人”其无知自大之相亦可见。顽固僵化与无知自大形成了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消极抵抗、对于自身积极保守的心理。在这一心理支配下，清政府以迷信对抗科学，以落后的封建文明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结果一败于英国，再败于法国，三败于日本，最后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无地自容。而就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说，对于民族文化中消极一面的固守则形成一种信天命、崇权威、信经验、重保守、行排外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做为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使当时的一切社会现象大至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小至清朝内部事务都打上了它的印迹，发生于近代的两次农民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也深受这一心理的制约。

首先是信天命、崇权威心理。最典型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起义于金田村，随即挥师北上，在短短的十四年里横扫大半个中国，其先头部队打到天津，使清朝政府大为震惊。太平军以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宣传基督教义开始，从表面上看，似乎太平天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实际上，洪秀全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体现中国信天命、崇权威的社会心理的。洪秀全把清帝说成是“阎罗妖”，称自己是镇妖除邪的“天王”，目的在于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崇拜上帝耶稣，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之弟，被派到人间“斩邪除正”，把耶稣的形象改造以服从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提倡“行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自己却首先娶嫔纳妃，并把此说成是“天意”。从金田起义起，洪就在太平军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永安建制、分封诸王、初步确立其统治体制，定都天京后，洪很快利用“信天命、崇权威”的社会心理，建立起“朕即国家”的等级制、独裁制、选妇制，太平天国政权逐步走向封建化。洪秀全这种心理欲演欲烈，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为一种迷信思想，即使在天京被围困的危急时刻，他仍然相信上帝会派天兵天将来拯救他，让军民吃树皮、喝露水迎战，拒绝接受李秀成让城别走的正确方略，致使天京陷落。

太平天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考察人们在这些事件中的文化态度，亦可看创“信天命、崇权威”心理在人们思想中的支配地位。1889年，掀起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百日维新运动。康梁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与英国君主立宪制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日英那里，设立议院，一切策略都由国会裁决，皇帝虽然存在，但不干预国家大事，在康梁那里，把皇帝的权力奉为至尊，在封建政府允许的范围内“立宪法、开国会”，表现出对皇权思想、天命观念的服从。

戊戌变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其中最明显的是洋务派

和维新派的冲突。洋务派成员湖广总督张之洞尽管是革新派，但他在1894年却写出《劝学篇》与康梁对抗，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极力反对民权，认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总之，兴民权是“无益而有害的”。尽管在民权问题上有争议，但洋务派和维新派在“崇权威”上是一致的，他们的主张同样获得光绪皇帝的赞赏就是明证。戊戌变法，康梁的崇权威心理还只表现为对皇帝的依靠，并利用这一心理推行新政，及至变法失败，谭嗣同于菜市口被杀，光绪帝被囚，康梁亡命海外，又在历次斗争中组织保皇会，这种心理就更明显了。

如果说崇权威的心理与维新变法主张还有相通之处，那么，当变法失败，人们以别样的方式寻求救国之路时，它就成为革命的劲敌，这从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对立中可以看出。

1899年，流亡到海外的康有为组织保皇会，保皇会利用人们的崇权威心理，自一成立就获得众多人士的拥护。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做为两股革命势力，在是否保皇的问题上一直展开论争，虽然在1909年同盟会成立后的论争中，改良派失败，但改良派还是积极开展活动，与革命派武装起义、暴力斗争不同，改良派则组织请愿活动和收回利权的斗争。国民政府的建立，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民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而从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袁世凯、张勋复辟的丑剧可以看出崇权威的心理仍然在人们的思想中发挥作用。

其次是“信经验、重保守”心理。这种心理突出表现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看法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内部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分别在政治、军

事领域内采取一系列近代化措施,进行改革,他们打着“自强”“自富”的旗号,不论主观动机如何,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可是,这一行动却遭到来自统治阶级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

最先持反对意见的是大学士倭仁.,1866年洋务派首领奕訢上奏要求在京师天文馆内添设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的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立即遭到大学士倭仁等保守势力的反对,结果,虽然准奏,但应试者寥寥。

1874年,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小楷试帖,另开“洋务一格”以资造就,立即有守旧派于凌辰叫嚷,说他们“外事洋人,可耻殊甚”。

1872年、1879年,李鸿章、曾国藩奏请派留学生出国,清政府虽然派120多留学生出国,但严令学生“穿华服、保存辫发、守祖孔之礼”。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和自身思想保守,李不得不于1881年撤回全部留学生。

在经济领域内这一心理同传统的迷信思想结合在一起,同样阻碍着改革。清政府内顽固派官员视火车为妖怪,对修铁路更是深恶痛绝。1865年、1876年外国人在北京上海修建铁路,均被拆除,说是怕冲了风水。80年代初,李鸿章冲破传统心理,修建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结果清政府下令禁止使用,只许用马拖。以后李鸿章又建议修建铁路,遭到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几十名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修建铁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无事生事”,是“开门揖盗,有伤朝廷之教化”“坏天下之风气”。

在维新变法中同样存在着这一文化心理。

康梁变法是变清政府的专制制度为由资产阶级各党参政的君主立宪,这是顽固派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祖宗之法不可

变”，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地方上的守旧势力如湖南的叶德辉、王先谦等人攻击康梁的主张是“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为乱臣贼子布置党徒，以逆其自私”。

最后是排外心理。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敌入侵，社会各阶层都提出了自强主张，最初是洋务派与顽固派对自强的分歧。顽固派认为不必学习外国，中国自古就有的礼仪制度自有胜过外国的地方。当时的大学士倭仁就说，“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抨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仪廉耻之大本大源”“败坏人心”，“用夷变夏”。

洋务运动受到排外心理阻滞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丁日昌，他积极参加洋务运动，支持派遣留学生出洋，建议创建近代海军，可是他的一系列行为，竟被排外势力所不容。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江南，被唤作“丁鬼奴”。

排外心理不只出现在统治阶级内部，在社会下层中，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义和团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义和团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但由于中国农民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就把凡是与“洋”字有牵连的人全部杀掉。他们把洋人称作“大毛子”、把与洋人有关的人称“二毛子、三毛子……对他们必杀无赦”，连倾向外国的光绪帝也被列入到毛子之列。他们提出“挑铁道，把线砍，旋即再毁大轮船”。据记载，义和团最恨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仿洋工，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义和团的排外心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文明行为。更重要的是由于共同的文化心理制约，作为受压迫者与作为统治者双方：义和团团员与清庭顽固派竟然能够互相宽容，而一旦阶级利益上升到主要地位时，义和团被扼杀，也就是必然的了。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由于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社会发

生着深刻的政治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受传统文化制约的中国社会心理无不表现为保守的态度,传统做为一个巨大的惰性力量而存在。

二 来自传统内部的变革呼声

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怎样才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改革家首先探讨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探索过程中,由于共同的社会心理制约,外来文化进入他们视野时,均被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洋务派的器物变革、维新派的体制改良,还是革命派的体制革命都是以传统为依据的,把传统做为最高原则,力图从传统内部寻找力量,由此形成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变革浪潮。

(一)三种不同的探索方式

鸦片战争前,封建社会内部敏感的知识分子就看到封建统治的危机,力图倡导变革。龚自珍就是清末社会的一位改革家。他看到当时吏制的腐败,呼唤贤人政治,他的思想从儒家的立人开始,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的保守态度。如果说,由于时代的限制,龚自珍对西方文化还缺少了解,那么到了另一位思想家魏源那里,对西方认识则深刻得多了。魏源首先以《海国图志》突破“天朝大国”的观念。魏源说:“夫夷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名,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仪,上通天德、下察地理,旁彻物

情，贯穿古今者，是嬴奇之士，城外之良友，尚可谓之夷狄乎？”魏源虽然继续沿同“夷”的称号，却没有轻视外国人之意，相反他视西洋诸国为有“教化之国”，他们“明礼仪、通天象、察地理”，是“奇士”、“良友”。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论点。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这些都可以转变为中国之长技，强国御敌。他认为学习西方应本着势变、道不变的认识，并从传统的经世致用之术中寻找那些切中时弊的措施。这些思想直接影响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纲领。

在魏源之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与此同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发表了《局外旁观论》，向中国政府“献策”，提出“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的好处，官均可留而遵”的建议。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方不能及，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拙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又说“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认为西学乃“偏端之异学，唯有中学能培养国本”。其后曾国藩等人又给以补充，而将“中体西用”给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明的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在总结洋务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体西用给以理论概括。他认为，中学是“体”、“道”，西学是服务于体的“用”和“器”，中学是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西学是指西方国家的声、光、电、化及练兵、制器、办厂、采矿等学，中学的“体道”是“百行之源”，但是为了“补吾阙”，“起吾疾”“应世事”“济时需”，在不变道的前提下，对于“西学”“西政”“确实有用者，不得不旁收博采”。可以看出，在洋务派那里，中学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它服务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是